

## 东乡族族源中藏族成分的历史考察

陈其斌

(青海民族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 甘肃东乡族生活的东乡地区历史上先后活动过古羌人、吐谷浑、吐蕃等甘肃藏族先民。藏族是东乡族族源的重要成分。

关键词: 东乡族; 古羌人; 吐谷浑; 吐蕃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07)03-0052-05

On the History Investigation of Tibetan Composition  
in Dongxiang Clan Source

CHEN Qi-bin

Abstract: Gansu Tibetan nationality ancients such as old Qiang people, Tuguhun, Tibetan had lived and worked in Gansu Dongxiang county. Tibetan nationality is the important ingredient of Dongxiang nationality.

Key words: Dongxiang nationality; the ancient Qiang people; Tuyuhun; Tubo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中国东乡族的发源地和主要聚居区。东乡地区历史上活动的人群先后有史前时期的原始人、春秋战国至南北朝时期的古羌人、西秦至唐的吐谷浑人、唐至元的吐蕃人,以及元明以来的蒙古人、回回人、汉人、藏人等。本文论述的主旨,是要通过对东乡地区历史上生活过的甘肃藏族先民——古羌人、吐谷浑、吐蕃等的活动的梳理,对东乡族族源构成中藏族成分的因素与地位做一历史考察。

## 一、东乡地理环境与族源通说

东乡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镶嵌地带,其地域文化带有很深的汉藏文化的烙印。东乡族的形成,其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东乡县四面环水:东北至东南一边有洮河,北至西北一边有黄河刘家峡水库,西至西南一边有大夏河——这三条河流(水库)构成东乡县与临洮县、永靖县和临夏县的分界线;南有广通河连接广河县,全县唯一的一条境内季节河巴谢河(又名那勒寺河)横贯县南部数乡。除四周6%的河谷平川地带外,东乡

县域内94%的地方地势高拔、群山绵延、沟壑纵横。全县海拔最低处1735米,最高处2664米,89%的地方为海拔1900—2400米之间的山区。由六大山梁和六大山沟统率的大小175条山梁、3083条山沟构成的东乡地貌,为东乡县赢得了“地球的肋骨”的惊叹。虽然四面环水,但由于地势高,水面低,地形复杂,东乡县不但水地很少,而且农民吃水都很困难。东乡县常年干旱少雨,全县植被稀疏,农民靠天吃饭,也靠天喝水,生活十分艰苦。东乡的这种封闭环境为历史上各朝代躲避兵荒马乱和政治迫害(如元时蒙古亲王阿难答争夺政权失败,其15万蒙古部下大都藏匿于此)的人群提供了理想的去处,也为西域东来传播伊斯兰教的传教士在华夏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传播宗教提供了一个“文化孤岛”——至今东乡还有“先有东乡大礼拜寺,后有临夏八坊”的说法。这一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这一地区生活的人群交流、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并在此环境中长时期保存和传承。总而言之,在东乡族这一人们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为青海民族学院校级资助项目《西宁市东乡族经济文化变迁调查研究》资助成果,批准号:067017。

收稿日期:2007-04-29

作者简介:陈其斌(1972-),男,甘肃景泰人,青海民族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关于东乡族的族源,可谓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1.蒙古人为主说;2.混合说;3.吐谷浑人为主说;4.沙陀突厥人为主说;5.回回色目人为主说;6.萨尔塔人为主说。其中,混合说在建国以来一直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这种观点认为,东乡族是以居住在东乡地区的回族、蒙古族、汉族、藏族等多种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

## 二、古羌人在东乡的活动

东乡地区林家、黄家坪、甘家坪等古文化遗址的挖掘及对出土陶器、铜器的考证,已经证实,距今四、五千年前,东乡地区就有古代人类活动。在战国时期,东乡开始出现我国古代羌人活动的痕迹<sup>[1]</sup>。从史前时期的原始人群到战国的古羌人,东乡地区的人群开始第一次被“民族识别”。《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杨建新认为:“这段记述主要有三个意思。一是说羌族出于三苗;二是说尧舜时被迁至三危;三是说两汉时期羌的活动地区在‘河关之西南’,其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sup>[2]</sup>《水经注》主张三危山在敦煌县东南,《括地志》也持此论,认为三危即敦煌县东南的三危山。还有人主张河关在今甘肃临夏与青海交界处。杨建新认为三危泛指北方。据此,“徙之三危”就是原居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的上古民族部落中的一部分溯汉水,向北迁徙到了伏牛山、大巴山一带,也有一部分进入大别山一带,正式形成羌族。到战国时期,由于秦国势力的扩张,被迫离开汉水流域,溯白龙江西迁至青海地区<sup>[3]</sup>。应该说,甘青交界处包括东乡地区在内的河湟地区也有羌人进入。对此,《后汉书·西羌传》有明确记载:“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爱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

“秦汉时期,羌族社会仍以氏族部落组织为其社会基本结构。”<sup>[4]</sup>《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无弋爰剑后,“其子孙支分百五十种。”羌族内部种号名称繁多,以动物命名的有参狼、牦牛、黄牛、白马等;以父名母姓命名的有研、烧当、滇零、比铜钳等;以地理特征命名的有黑水、白水、赤水等。羌部落此时期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其部落首领是原始军事民主时期的军事首领,地位世袭,但由于经济落后,其组织极其分散。部落社会里,“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命,无它禁令”;“父歿则妻其后母,兄亡则纳嫠嫂”等。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对羌族的控制,设立了护羌校尉一职。东汉建立后,仍然

设护羌校尉统治西羌,治所主要设在狄道(今临洮)。护羌校尉的职责是“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但护羌校尉多以贪婪凶残著称,往往逼得羌民起义反抗,且羌民分散,不易管理,因此,汉朝对西羌各部采取羁縻政策,酋豪封王,诸侯封君,使羌族氏族部落社会组织得以保持。

总的来说,东乡地区这一时期居住的人群是古羌人。

东汉末陇西太守宋建割据,自封河首平汉王,东乡属于割据地方。后宋建被曹操大将夏侯渊生擒,东乡地方为曹魏政权统治。从三国到两晋,东乡仍分属金城郡和陇西郡。西晋末年设晋兴郡,东乡地区划归晋兴郡枹罕县境。十六国时期,东乡地区先后被前赵、前凉、后赵、前秦、后秦、西秦等国占据。前凉张骏时(公元335年)正式设立河州,州刺史驻枹罕,金城郡即今兰州地区以及汉中地区都归河州管辖,东乡仍在枹罕境内。

## 三、吐谷浑人在东乡的活动

西秦末期,吐谷浑部落进入东乡地方。

秦时开始对羌地的开屯,也应该包括对东乡地区的开屯。秦汉时期的屯田对开发河湟地区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应该有不少中原汉人进入河湟地区包括东乡地区,成为该地社会中人群组成的一份子。这时的东乡人,应该是以羌人为主,以汉人为辅。而在屯田的汉人眼里,当地原住民羌人就是东乡土人了。这一格局到西秦时为之一变,1700户西迁的鲜卑族吐谷浑部落来到河湟地区,在不到半个世纪从吐谷浑之父慕容涉归死亡时间公元282年算起,到329年吐谷浑之孙叶延正式以吐谷浑称呼其所统治的部众止的时间里,吞并当地羌人部落,正式以吐谷浑称呼其所统治的各部,建立起吐谷浑国。在建国后的百余年间,吐谷浑国以今青海都兰为中心,东征西伐,最终形成了一个东西三千多里,南北八、九百里,总面积达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从地图上看,今天都兰和东乡基本是东西向,其直线距离不足500公里。这足以证明当时东乡是吐谷浑的统治地。至此,东乡羌人一变而为吐谷浑人。

从羌人到吐谷浑人的转变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历史学意义上的族源认定,主要是一种政治认定,次之是一种文化认同,再次是血缘联系。

先看血缘联系。学界通说,吐谷浑的族源是鲜卑族。1700户鲜卑族的吐谷浑部即使从吐谷浑之父慕容涉归去世之时,即公元282年起算,到吐谷浑之孙叶延掌握政权,以吐谷浑之名称呼其统率各部这一标志“吐谷浑民族形成和政权正式建立”<sup>[5]</sup>之时,即公元329年,短短47年,鲜卑血统绝不会在吐谷浑

子孙三代之间开拓的“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sup>[9]</sup>的广阔领土上繁衍成种族第一的民族。换言之，以血缘联系为标准看民族族源，则吐谷浑族的族源应该是这一广阔地区人口众多的羌人，而不是鲜卑族。

其次看文化认同。河湟地区由鲜卑族吐谷浑部与当地羌人融合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吐谷浑族与东北鲜卑族的文化差异很大。在经济生活上，东北鲜卑部落已由牧业转为农业或半农半牧，而吐谷浑族则操持畜牧业。鲜卑人髡头，吐谷浑人衣冠鲜美。法律制度上，鲜卑人已有复杂、完整的法律政治制度，吐谷浑人“杀人及盗马死，余则征物以赎罪”，处死时“以毡蒙头，持石从高击之”。<sup>[10]</sup>宗教上，鲜卑人“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sup>[11]</sup>吐谷浑至南北朝时已信仰佛教。这些文化上的明显差异构成两个民族的界限。对吐谷浑部来说，其子孙三代在河湟地区的开疆辟土政治统一过程，其实也是自身文化被当地羌人土著同化的过程。这种文化的一体化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对于广大的人数众多的羌人土著而言，臣服于一个人数虽少但文化被自己同化的部落，在心理上已经没有了“非我族类”的障碍。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因此，从文化认同来看，吐谷浑族的族源也应该是当地土著羌人，而非鲜卑族。

最后，既然从血缘和文化上分析，吐谷浑的族源都应该是羌人，那么认定吐谷浑族源为鲜卑族的主要标准就是政治统治。民族是以地缘为基础的的人们共同体，它不同于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由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酋邦发展而成，脱离了部落阶段的人们共同体，便开始形成民族。对此，马克思有精辟的论述：“只有当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时……这时民族方始产生。”<sup>[12]</sup>吐谷浑部虽只有1700户，而其所吸附的土著动辄以“五、六百落”、“一万三千落”计，但在政治上吐谷浑部却是统治阶级，而广大的被吸附的羌人土著则是被统治阶级。吐谷浑国建立后，其长达三百多年的政治统治，已经使当地人群的政治认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经济生活的一致和文化生活的一体，与长时期的高度统一的政治生活一起，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休戚与共、生死相连，这种事实上的血浓于水的密切关系就为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塑造成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以吐谷浑命名的“想象的共同体”里，强化统治阶级正统血缘的要求与生俱来，相应的则是羌人“记忆的丧失”——一种集体的失忆，是新的民族共同体团结和发展的必然牺牲。这样的情形，我们在中国王朝史的更替中，从普通大众对诸多霸

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家族统治先被迫次自愿最后誓死捍卫的认同中，应该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吐谷浑这个名字，由人名而部落名而政权名而民族名的经历，既是政权国家的形成过程，也是民族的“文本化”和“田野化”<sup>[13]</sup>形成过程。史书所记载的我国古代民族，其兴衰存废大致都有同样的过程。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说：“春秋以后，住居中原的‘夷’、‘蛮’、‘戎’、‘狄’尽被所谓‘诸夏’所混合、同化，于是人们就渐渐忘了春秋以上的情形。一般人只记得西周为戎族所灭，而齐、鲁一带称夷之族很多，又春秋时诸夏惧怕北方狄族的余影还在，而且从楚国强盛以后，因楚称蛮，人们就把楚代表了蛮。这样一来，夷、蛮、戎、狄便渐渐地与东、南、西、北发生了比较固定的联系了。”<sup>[14]</sup>杨建新先生也指出，西周和春秋时戎族是“西方诸族中影响十分巨大的一个民族，正因为如此，其名称方成为后人对西方诸族的通称”。<sup>[15]</sup>吐谷浑成为西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尤其是河湟地区诸民族的通称，也是同样的道理。

族源的认定标准，大类而言，无外乎三种：最基本最原初的标准是血缘，家族谱系就是缩小了的族群谱系；最普遍最充分的标准是文化，文化（如语言、习俗、经济、心理等）的相同相似是认定族源的常规标尺；第三种即我国历史学认定族源的学科标准——政治正统标准。族源研究虽然会因个人旨趣或时代形式而选择不同标准，推论各自认为正确的或合适的答案，但在探究学问的朴素意义上，我们对一个民族的族源探讨，正如我们对一个已有正式民族归属的家庭的调查一样，不是论证民族族源的正统性正确性，更不是要比较其血统的高贵卑下，而仅仅是满足我们对事实的渴望和对相关理论的不懈追求。比如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有一批五、六十年代支边的汉族青年，现在政府的户口簿上，他们的民族全部是藏族。这里面既有对一个民族的认同，也有文化的同化，更有对民族政策实际利益的权衡。总而言之，是当时当地的现实情况使他们自愿地而且是强烈要求地改变了民族成分。但我们在调查研究他们的族源时，必须要指出其汉族族源的事实，而不是顾忌到有可能损害他们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好处、利益而掩盖事实。就事实认定而言，族源认定的科学标准应该是血缘。

如上所论时期西北河湟地区包括东乡地区土著化羌、羌化吐谷浑直至唐时吐谷浑化吐蕃的历史，以及上述西方诸族“化约”为戎族的历史，都给我们一个族源研究上的启示：族源研究不能望文生义，以统治阶级之血缘为民族之血缘，而应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四、吐蕃在东乡的活动

北魏太武帝拓拔焘时东乡归枹罕镇,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恢复河州名称。隋初,隋文帝设立兰州总管府,东乡归兰州管辖。大业初,又将兰州改为枹罕郡。唐时仍设立河州,范围与现在临夏地区相当,东乡仍在河州枹罕县、大夏县境内。唐代宗初,河州地区为吐蕃贵族占领,延及唐末、五代一直到宋代,河州一带仍在吐蕃势力范围之内。

随着吐蕃势力占据河湟地带,东乡地区认同于吐谷浑的大众现在又认同于吐蕃。“仪凤元年(676年)吐蕃军大举进入鄯治(今乐都、包括湟水流域)、廓(治今青海尖扎县北)、河(治今甘肃临夏县西南)、戎(治今甘肃甘南迭部东南)诸州,统治了这里的羌、党项等族,同时也迁来了一部分吐蕃部落,使这里成为在政治上以吐蕃人为主的多民族地区。”<sup>[12]</sup>西北“多民族地区”的表述不同于以前羌、吐谷浑等单一民族的表述。之所以没有将这一地区的活动人群单纯界定为吐蕃人,是因为羌、吐谷浑、党项等族在此活动的史料至此已经很丰富,也与学者的认识的深化有关。“天宝以后,吐蕃北侵,吐谷浑部落又迁至朔方,即内蒙古与陕西交界的靖边一带,在这个迁徙过程中,吐谷浑有的部落进入河西、有的进入河东。以后虽然还有吐谷浑人的活动,但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此后就逐渐不存在了。他们大部被吸收入藏族,或成为河东、河西的汉族,以及西夏的党项族。这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多年。现在青海的土族,有人认为即吐谷浑族的后裔与蒙古和其他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sup>[13]</sup>由此可见,民族的融合,既是政治上的臣服认同,又是文化上的交流重构,也不乏民间通婚的互动往来。

五代、宋代时期吐蕃在西北地区的统治瓦解,吐蕃部落在甘肃境内“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无复统一。”<sup>[14]</sup>河、秦、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sup>[15]</sup>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阆,往往见吐蕃族帐。”<sup>[16]</sup>

元代设河州路,归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所辖,下设定羌、宁河、安乡三县,东乡属安乡县。这一时期,东乡地方上除吐蕃化、汉化的吐谷浑人外,开始出现蒙古人 and 中亚回回人的新面孔,东乡族这一独特的人们共同体在这些不同种族、民族的人群的互动融合中得以逐步形成。

#### 五、东乡族族源研究中藏族成分的表述

由以上论述可知,东乡地区历史上曾经长时期生活过甘肃藏族先民——古羌人是藏族先民的一部分,吐谷浑多半吐蕃化,而吐蕃到清代即被称为

藏族。对于甘肃藏族的族源,洲塔教授认为甘肃早在文字记载的初始年代起,就是羌人的居住地。唐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控制甘肃全境后,“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地方,除了驻军和从吐蕃本土迁来部落驻牧外,亦在当地羌汉人中编制部落,以便于统治。随着羌人各部落的吐蕃化,以及当地的汉人被编进吐蕃部落,甘肃境内的羌人和吐蕃人及部分汉人实现了结合,并以吐蕃部落的组织形式出现。这为甘肃藏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以后,虽历经了吐蕃政权崩溃后各部落互不统属、互为雄长的长期动荡,而各部落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均未发生大的变化,到了元明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甘肃少数民族——藏族已经正式形成了。”<sup>[17]</sup>

对于这些在东乡地区长期生产生活的甘肃藏族先民人群,历来研究东乡地区人文历史,尤其是研究东乡族族源问题的学者均有论述。

1953年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记载,东乡族族源有“吐谷浑的后裔说”。调查时四家集老人马福同说,唐王令三千住西安的阿拉伯人在娱乐会上选妻,阿拉伯人抢汉、蒙、藏各族女子为妻,其后代便成了以后的东乡族。并说虽然东乡族的话多是蒙语,但也有汉话、藏话。<sup>[18]</sup>

1981年马通先生在其发表的文章中认为:“东乡地区,秦汉属于氐、羌;东晋到隋,属于吐谷浑;唐属吐蕃;宋属党项;元以来,藏、土、回、东乡及汉等各族杂居。从东乡族的历史传说和现状看,东乡族和氐、羌、吐蕃关系不大,而与吐谷浑、蒙古和中亚人的关系较为密切。”<sup>[19]</sup>

1983年马志勇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东乡族形成中同时也直接间接地与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撒拉族、藏族等民族发生了关系——东乡族中杨、阎、卡、尹、多等姓的人多是改信了伊斯兰教的藏族发展演变而来的,如百合乡的杨姓东乡人解放以前还向桌尼土司上草纳粮。”<sup>[20]</sup>同年出版的《东乡族简史》中指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东乡族是由聚居在东乡地区的许多不同的民族的成分,逐渐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东乡族族源的主要成分是回回人,蒙古人。此外,汉族人、藏族人也是东乡族族源的重要成分。”<sup>[21]</sup>藏族也是河州、东乡一带的老住户。如前所述,自唐代以来,这里长期为藏族占据,大量藏族迁移到这一带。元代将吐蕃宣慰使都元帅府设于河州,就说明这里藏族数量是不会少的。特别是元英宗即位不久,即根据当时充当帝师的西藏喇嘛的要求,改变由蒙古人任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的惯例,任命藏族人蘸八儿监藏为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这就更使河州、东乡地区的藏族人的数量大增。东乡族自治县羊腊家地区的杨家等,都说自己的祖先原是藏族。因此,从

民族地理关系方面看,藏族人也有—定数量被融入了东乡族。<sup>[12]</sup>

1990年马志勇讨论河州土司何锁南时认为,“何锁南是吐蕃吐番、藏族---何锁南毫无疑问是番族,而且是番族中的沙马族---何锁南家族虽是番族,但自民国以来已经汉化。”<sup>[123]</sup>

1996年出版的《东乡族自治县志》记载:“东乡族自称‘撒尔塔’,有语言、无文字,是个勤劳、勇敢、富有开拓精神的民族。是13世纪20年代成吉思汗西征时从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被迫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色目人,以这些人为主体,融合了当地一部分汉、藏、蒙古等民族,逐渐形成民族共同体——东乡族。”<sup>[24]</sup>县志还记载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东乡县有藏族10人,较1964年的“二普”时多1人。宗教上也有信藏传佛教,1985年有喇嘛寺4所,喇嘛5人。“河滩乡临河一道川,因喇嘛的寺院多,称喇嘛川。是喇嘛三川之一,红塔寺、庙坪寺、地滩寺、麻汉寺等4座和尚寺院先后成为拉卜楞寺院在关内管辖的28座寺院之一。寺内喇嘛和尚分庭生活。寺院每年到河州东门大寺领取由拉卜楞发放的喇嘛口粮。到清光绪年间,除董岭乡赵家、梵音两寺和尚外,其他和尚陆续走散,寺内只剩喇嘛僧侣——大多数信众已逐渐偏信于藏传喇嘛教。建国前,全县和尚寺院2座,喇嘛寺院6座,庙宇2座。在寺喇嘛17名,和尚6名。1958年开展反封建特权的斗争中,全县所有寺院、庙宇全部废除,教职人员全部遣返原籍——1987年宗教部门批准开放的寺院有唐汪庙坪寺喇嘛寺院、红塔寺喇嘛寺院、河滩麻汉寺喇嘛寺院,共三座寺院。”<sup>[25]</sup>

2002年谢小冬等人在国内外首次运用DNA技术分析东乡族群体遗传数据,结果表明:“根据D13S317基因座遗传标记,东乡族基本上与回族、藏族及北方汉族相接近,反映了它与这些民族在渊源上的密切关系。”<sup>[26]</sup>

2003年出版的杨建新先生著作中指出:“总起来说,我们认为,东乡族是14世纪后半叶,即元末到明初住于东乡地区的回回人、蒙古人、汉人以及藏族人共同融合而成的。在他的形成过程中,使用蒙古语的那部分回回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那部分蒙古人起着主导的作用。”<sup>[27]</sup>

另外,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在“按户主与配偶的民族分的人口”中,东乡族男户主娶24个藏族妻子,东乡族女子嫁给藏族男子的为零。

以上材料说明,在东乡族研究中,学者们不同程度地注意到藏族及其先民在这一地区的生产生活情况,对于东乡族民族成分组成中的藏族成分给予了相应的认可和表述。东乡族的形成,西北多民族地区诸多民族的形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均

经历了一个多元开放的长期历史形成过程。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开疆辟地、抵御外辱、建设家园的过程中,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归属认同,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与此同时,各民族人民又你来我往,我来你往,在不同的地区因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影响而创造了类型殊异的经济文化区域文明,形成了各具特征的人们共同体的族群界分意识。对东乡地区藏族先民的活动及其在东乡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促进我们对这种中华民族各民族的互动互融而又相对独立的特征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 注释:

①文本化指民族族源的文章著作记载描述;田野化系笔者用来与文本化对应,是指事实上的族群聚散分合。

#### 参考文献:

- [1]杨建新.东乡族简史[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0.
- [2][3][4][5][11][12][13][27]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M].民族出版社,2003:199.
- [6]宋书·吐谷浑传[M].
- [7]北史·吐谷浑传[M].
- [8]三国志,魏志[M].此为乌丸之俗,鲜卑与乌丸同俗.
- [9]马克思.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M].人民出版社,1965:96.
- [10]董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C].中华书局,1962:50.
- [15]邵伯温.闻见录,卷13[M].
- [16]资治通鉴长编,卷149[M].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 [17]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M].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11-12.
- [18]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R].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53.54.
- [19]马通.浅谈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J].甘肃民族研究,1981年创刊号.
- [20]马志勇.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1).
- [21][22]东乡族简史[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5.19.
- [23]马志勇.河州土司何锁南[J].甘肃民族研究,1990,(2).
- [24][25]东乡族自治县志[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2.147.
- [26]谢小冬,王勋陵,安黎哲.从群体遗传的DNA线索看东乡族族源问题[J].民族研究,2002,(1).

[责任编辑 张 科]

[责任校对 陈亚艳]